新世纪
文学观察

主编：续小强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

张艳梅◎著

作家所属的时代转眼灰飞烟灭，那些热闹或寂寞的作品也将被尘封，有多少往事并不如烟？作家的独特性像迷宫一样吸引后来者，抑或像一面镜子，让走在文学刀锋上的双脚或者高山仰止或者诚惶诚恐。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

张艳梅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 / 张艳梅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 /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7-5378-4010-1
Ⅰ. ①新… Ⅱ. ①张…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Ⅳ.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130 号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书　　名：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
著　　者：张艳梅
责任编辑：赵　静
装帧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45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印　　张：21.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010-1
定　　价：45.00 元

出版说明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新世纪中国文学酝酿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征。应该说，把新世纪文学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演进发展的新阶段，是可以成立的。

约略八十年前，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了及时回顾总结这十年的文学发展，赵家璧先生延请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学名宿，编选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1927年）。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后来者的启示作用也日益突显。

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我们组织出版这一套“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的根本要旨却与当年赵家璧先生约略相同，我们亦希望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分阶段地对新世纪文学做认真的捡拾、回顾与总结。本丛书依照文学文体的分类，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与研究；所延请的作者，无论年长年幼，均是长期以来对相关文体做跟踪研究的学者或批评家。故而，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是新世纪文学创作成就的展示，同时也是新世纪文学批评与研究实绩的见证。

我们期望，本丛书的推出，既可以推动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创作向更纵深

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成为作家和读者了解新世纪文学的一扇窗口，更可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从某种角度充分说明，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正处于一个极好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日子里，传统的文学样式当会有更好的发展，如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亦会呈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这一套丛书也将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第一辑之后，一定会有不断的跟进。举凡有学术创建、以新世纪文学为考察研究对象的书稿，我们就会将其纳入进来。一方面，我们要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鼓与呼；另一方面，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关注，将是北岳人恒久的出版责任和使命。

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续小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代序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新世纪小说创作，一个不容否认的显在事实，即是长篇小说的异常繁荣发达。或许是因为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更能够涵容表现时代生活内容，能够更集中地凸显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从而体现作家高端写作成就的缘故，自打 1993 年的“陕军东征”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把自己的主要写作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之中。有了作家的如此一种情有独钟与倾心投入，长篇小说写作的水涨船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我们绝无所谓的文体歧视意识，我们坚信小说文体长短平等的艺术理念，但冷静客观地打量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恐怕就是长篇小说总体成绩的相对突出。但在充分肯定长篇小说之时代第一小说文体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也仍然有一些作家在坚守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阵地。这其中，既包括铁凝、韩少功、毕飞宇、苏童、陈应松、王祥夫、蒋韵、迟子建、刘庆邦、范小青、葛水平、叶弥、王松等一批著名作家，更包括从代际来说的所谓 70 后、80 后作家。大约与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的双重积累都存在一定关系的缘故，这些更年轻一些的作家，虽然也已经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但无论是就写作精力的投入程度来说，还是就实际写作成绩的取得而言，他们的主要文学成就还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更具体地说，这里提及的年轻一代作家，主要包括有徐则臣、李浩、鲁敏、乔叶、盛可以、李师江、王十月、魏微、戴来、张楚、胡学文、金仁顺、张惠雯、笛安、阿乙、孙频、田耳、

滕晓澜、葛亮、东紫、王秀梅、蒋峰等。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些作家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方才有了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多元并存的艺术繁荣局面。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观察视野出发，我以为，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思考

一提及“中国问题”，我们很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中国文坛曾经一度众说纷纭的“中国经验”。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中国经验”，虽然貌似距离不大，但二者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所谓“中国经验”，更多地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是在形式层面上强调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学经验的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而所谓“中国问题”，在最浅表的意义层次上，首先指的正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所实际面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处于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到底如何的问题。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动态，就应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于当下时代中国所面临种种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已经成为一切有识之士的一种自觉行为。对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目前一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状况，钱理群曾经进行过非常透辟的揭示：“记得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 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 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还随时会有新的爆发。而这一年，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1]

[1] 钱理群《保存我们心中的美》，《随笔》，2011 年 1 期。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物事，面对着当下时代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文学自然也没有成为缺席者。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这一点，也同样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比如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情形即是如此。作为一位有着亲历性打工经验的年轻作家，王十月的小说关注表现的依然是当下时代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劳资矛盾。但值得肯定的是，王十月对于劳资矛盾的表现明显地突破了既往小说中总是会“妖魔化”资方老板的艺术窠臼。一方面，作为资方老板，小老板自然有着过分盘剥压榨员工的行为，张怀恩之死显然与此有关。但在另一方面，自己也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小老板，之所以逼迫员工日夜连续加班，乃是因为他自己也欠债太多，急于偿还债务的缘故。不独如此，到最后，因为张怀恩家人的反悔，四面楚歌的小老板终于走投无路，唯有自寻短见了事。如此一种凄惨结局，所召唤来的，自然就是读者的悲悯同情。某种意义上，张怀恩与小老板的双双弃世本身，乃可以被看做是劳资双方共同为现代化付出的代价。

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对于资本在当下时代所日益显示出的巨大威力的揭露，同样格外犀利有力。如果说既往的中国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完全笼罩在政治阴影之下的话，那么，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就毫无疑问地步入了一个经济时代，经济已然成了主宰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心事物。在如此一个社会性质根本转型的过程中，作为金钱化身的具有某种无孔不入特质的资本，的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力量。正因为余一鸣对于资本的作用有着敏锐真切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才会在《入流》中把自己的批判视角首先对准了“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的资本。说到对于资本罪恶的批判，小说中最典型不过的，恐怕就是被江湖上赠送一“白脸”绰号的郑守志的发家历程。郑守志的父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有过辉煌的过去。“文革”时，由于父母进了“五七干校”，郑守志先是下放农村，后来进入工厂，成了一名优秀的机修工。“文革”结束后，伴随着父母的官复原职，郑守志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成了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但就在他的命运看起来就要顺风顺水的时候，乖戾无常的命运向他露出了狰狞诡异的一面。在父母贪污行为被举报而锒铛入狱之后，郑守志不惜荒废学业，最终把父母的政治对手弄下了台，为父母报了一箭之仇。他自己，也因为学业的荒废而被工学院除名。被除名后

的郑守志，只好依赖自己修柴油机的专长而勉强谋生。也正是在这个跌打滚爬的艰难过程中，郑守志开始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长江水滔滔东去，郑守志伫立码头，不知道自己的前方是什么。但是他在这人声嘈杂的码头，已经嗅到了空气中越来越浓的金钱气息。一个金钱的时代已经到来，关键是每个人必须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

当然，说到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在这一方面最不容忽视的，恐怕就是自上世纪末即已兴起，在新世纪可以说已经蔚为大观了的“底层叙事”潮流。其中，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恐怕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篇。小说所描写展示的，确实是一桩令人惨不忍睹的血案：两个出身底层贫困阶层的挑夫，因为财富的缘故，不无残忍地接连杀死了七个踏勘队员。对于这篇小说，王晓明曾经有过极其到位的解读分析：“作家用了相当精细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写出挑夫和勘探队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如何由最初的友善、艳羡、以貌取人和隔膜，逐渐生出误解、不信任、紧张、彼此提防、嫌厌、仇恨、绝望，最后拼死一搏。……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分别站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惯性行动，就一定会彼此冲突、不可收拾？这小说里的人事变化的逻辑，难道真是要昭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倾斜到如此程度，不同阶层的人是越来越难以平和相处了？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你立刻就会发现，祝队长和九财叔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和心理内容：城乡差别、阶层分化、文化隔膜……”“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就是一个例证，它不但以惊心动魄的故事，凸显出社会冲突的巨大的死结，更以九财叔这个轮廓分明的形象，表现了对于被压迫者的一种开阔、犀利、无所避忌、因此也就称得上是深切的眼光和关怀。”[1]能够以如此一种兼具犀利与悲悯的方式思考表现当下时代迫切的“中国问题”，凸显出的正是陈应松特别的思想艺术智慧。

更为尖锐地谛视社会矛盾冲突、准确到位地把握时代精神内涵的，是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小说的主人公涂自强，是一位出生于边远山区穷困家庭的大学生。品学兼优的他，尽管一直认认真真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人生态度始终积极努力，但却终归不能改变自己仿佛早已注定了的悲剧命运。非常明显，涂自强的个人悲剧，与当下时代的固层化现实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倘若说在

[1] 王晓明《红水晶与红发卡——读陈应松〈马嘶岭血案〉》，《读书》，2006年1期。

1980 年代，涂自强们尚且能够凭借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到了当下这个阶层固化的门阀时代，涂自强们再怎么努力也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自然也就只能够“徒然”自强了。“徒然”自强者，无济于事也。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现实，事实上业已完全堵死了涂自强们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改写自身命运的通道。更进一步说，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糟糕现实的形成，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制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惟其如此，在阅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才会不时地联想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虽然各自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具体的呈现形式有别，但从本质上说，我自己，甚至于我周围的很多人，却又何尝不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涂自强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方方此作中借助于采药之手写出的那首小诗：“不同的路 /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 不同的脚 /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 从此我们就是 / 各自路上的行者 / 不必责怪命运 / 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非常明显，小说标题的出处就在于此。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涂自强的悲伤，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个人的悲伤，而只能够被看做是一种时代普遍的精神悲伤。方方能够以犀利的批判笔触，洞穿时代沉重的盔甲，把这样一种极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呈示在广大读者面前，绝对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面对着涂自强这样一种沉痛的悲剧命运，我们就不能不仿用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篇《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追问一句：“谁在当下中国能过上好日子”？！

要想对于当下时代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有所发现，对于“中国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思考，所需要的，除了作家本应具有的敏锐艺术感觉之外，更应该具备的，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考能力。以上这些作家之所以能够对于在“中国问题”上有出色的表现，与他们自身思想艺术能力的具备关系密切。

对于巨大变迁时代民族心灵轨迹的捕捉与展示

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曾有论者指出：“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1]或许因为文学本就是一种高端精神产品的缘故，文学似乎天然地就和人的主体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精神世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如此，新世纪以来的中短篇小说也同样如此。遭逢一个社会矛盾格外尖锐复杂的“大变局”时代，人们的心灵到底会生发出怎样的一种变化，人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杂乱的状貌，所有这些，都在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女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铁凝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就是这样一篇揭示女性情感隐秘的作品。伊琳娜是一个叙述者“我”在长途国际飞行途中萍水相逢的俄国女性，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艳遇故事没有能够发生的故事。或许是因为长途飞行过于寂寞的缘故，伊琳娜和自己身边的瘦子旅客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情感碰撞。一方面，是来自于瘦子旅客的挑逗行为，但在另一方面，却更是伊琳娜自己内心世界中的情感骚动。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种场景描写：“我看见伊琳娜的手激烈地抵抗着，瘦子则欲罢不能地使用着他强硬的腕力，仿佛迫切需要伊琳娜的手去抚慰他所有的焦虑。两只手在暗中彼此不服地又一次较量起来，伊琳娜由于力气处于劣势，身体显出失衡，她竭力控制着身体的稳定，那只被瘦子紧紧捉住的充血的手，拼死向回撤着。两人手上的角力，使他们的表情也突然变得严峻，他们的脑袋不再相抵，身体反而同时挺直，他们下意识地抬头目视正前方，仿佛那儿正有一场情节跌宕的电影。”这里，虽然看起来是在描写瘦子与伊琳娜之间的一种角力行为，但实际上作家却是在借助人物外在动作的描写折射表现伊琳娜内心的一种激烈冲突。这就是说，面对着一场突如其来的艳遇机会，伊琳娜自己陷入了一种心理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她确实有着一种强烈的本能欲望冲动。但在另一方面，她的道德理性却也在强有力地弹压着此种本能冲动。就这样，铁凝以其突出的艺术表现能力，将伊琳娜一种复杂真实的人性状态成功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面前。人都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在短篇小说的写作领域，却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情况来。铁凝的小说即使如此。伊琳娜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她却一直到小说的大约三分之一处，才开始出场的。前面的一大部分，铁凝都在讲述“我”与表姐之间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无话则长”。而到了故事的高潮部分，也就是面对着瘦子的强烈攻势，伊琳娜内心中激烈斗争的那个地方，铁凝却处理得特别简洁，她只是以很短的篇幅描写了伊琳娜和瘦子之间双手搏斗的动作而已。此所谓“有话则短”者是也。那么，铁凝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呢？“我”的体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是，前面的“无话则长”为故事的发生做好了充分的铺垫，而高潮阶段的“有话则短”则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可以任由读者驰骋自己的阅读想象能力。

同样是女性作家，盛可以那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女性意识殊为强烈的情感表现，与铁凝形成了有趣的映照。我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她那篇影响颇大的短篇小说《白草地》。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男主人公，名叫武仲冬。武仲冬，不仅家有娇妻，而且还有一个名叫玛雅的情人。从表面上看，武仲冬的情感生活相当风光。妻子“无可挑剔”，情人玛雅不仅不向武仲冬索要回报，反而还倒过来不断地送给武仲冬一些假冒的高档消费品。从红色的 Louis Vuitton 领带，到 Pakerson 皮鞋，甚至于包括 Dior 内裤在内，真可谓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但盛可以强烈的男权批判锋芒，实际上就潜藏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深层。表面上看起来别无所求的玛雅，实质上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对于这一点，后来才彻底了解事情真相的武仲冬有着真切的揭示：“别问我后来怎么了，我不会和你一样很愚蠢地猜测蓝图到底知不知道我和玛雅的奸情，你应该立刻明白，心狠手辣的玛雅，她并不是忠诚的阿拉斯加雪橇狗，她是一头仇恨的母狼，多丽说‘沾上她的男人没有不遍体鳞伤的’，只是我现在才看见我表面完好，内里五痨七伤的生活，多么愚蠢的掩耳盗铃啊！”却原来，玛雅早就和他的妻子蓝图一起联手在暗中向武仲冬施以报复的举动了。报复的奥秘，就潜藏在蓝图给武仲冬每天早上都要提供的那杯盐水之中。那一杯盐水，其实并不是盐水，里头掺杂隐藏的正是所谓的雌性激素。到了这个时候，作家盛可以那样一种批判否定男性的异常鲜明坚决的女权立场，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而这，也才真正是盛可以一贯的思想底色所在。不能忽视的，是作家艺术表达上反讽手法的巧妙使用。在小说中，叙述者兼男主人公武仲冬那样一种表面上仿佛能够操控一切的洋洋自得状，与他实际上的一败涂地之间，所形成的，正是所谓的艺术反讽。很大程度上，正是武仲冬这一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特别设定，保证着盛可以《白草地》的思想艺术成功。

尽管女性作家在情感的捕捉与表现上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她们有着垄断的权力。放眼新世纪中国文坛，男性作家中也同样有情感表达的高手。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恐怕就是毕飞宇。比如说，他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大雨如注》的可贵品质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关怀与人

性关怀上。小说所关注思考的，是当下时代越来越严重了的中国教育问题。小说的中心人物姚子涵，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父母给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就这么三言两语，毕飞宇就写出了当下时代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对于孩子、家长的无端戕害。而这一大的文化语境，正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姚子涵悲剧的最终生成。为了充分捕捉表达姚子涵一种微妙的情感状态，毕飞宇特别设定了“大雨如注”这个核心情节。一天，一场瓢泼的大暴雨不期而至。在雨中，米歇尔尽情狂欢。正是在米歇尔行为的感召之下，一贯压抑的姚子涵也投入到了如泻如注的大暴雨中：“姚子涵只跑了七八步，身体内部某一处神秘的部分活跃起来了，她的精神头出来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姚子涵这辈子也体会不到暴雨的酣畅与迷人。这是一种奇特的身体接触，仿佛公开之前的一个秘密，诱人而又揪心。”正是这场不期而遇的大暴雨以及米歇尔的存在，彻底地打开了姚子涵被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压抑太久了的生命天性，表现出一个孩子天真的本性，实现了生命本真的回归。但对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批判却并非作家的终极写作意图所在，借助于教育问题，对国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精神困境做出自己的独特思考，才是毕飞宇更深刻的艺术追求所在。这里，一个极富象征色彩的细节是，姚子涵突然晕倒后一个星期醒来，居然只能够讲英语，再也说不出自己的母语。一方面，这个细节象征着不合理教育体制对于孩子正常人性的异化扭曲，另一方面，如果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说，则象征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或者英语霸权主义的赫然存在。国人一种普遍的情感精神困境，正是面对着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的。从艺术表现的层面说，毕飞宇这个鞭辟入里的结尾处理，具有一种突出的现代主义意味。能够自然而然地把现代主义交融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中，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毕飞宇一种突出的艺术构型能力。

人伦情感的细腻捕捉表达上，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归来》。如同王祥夫其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一样，这篇《归来》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母亲吴婆婆不幸因病身亡，远在他乡打工多年未归的幼子三小携妇返乡。三小总说要携妇返乡看一看家人，然而，等到他终于回到家乡

时，见到的却已经是母亲冰冷的尸体。这个时候，不仅他妻子怀里的儿子也已经三岁，而且三小自己也失去了一只胳膊，变成了独臂人。王祥夫是一位非常善于通过细节进行叙事抒情的作家，《归来》起首处极其内敛的细节中，实际上就包蕴着异常丰富的情感内涵。其一，儿子三岁，说明三小在外打工时间绝对在三年之上。其二，失去了一条胳膊，说明三小在外打拼之艰难不易。其三，三小一直思归而未归，说明的正是他对于故土和家人的一种浓浓情思。其四，等三小终于归来时，母亲已成一抔坟土，凸显出的其实是人生残酷的一面。其五，眼见囫囵人一个外出打工的弟弟三小变成了独臂人，“三小的大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啊呀三小？’停停，声音颤得更厉害：‘你这条胳膊呢？啊，这条胳膊呢？啊，三小？’”除了大哥的激烈反应外，小说并没有刻意地过分渲染三小那条失去的胳膊。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作家愈是不写，那条不幸的昭示着三小打工苦难境遇的胳膊便愈是要在场，愈有着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一个小说细节，居然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内涵，王祥夫细节能力的超乎寻常，由此可见一斑。然后，小说就进入了关于吴婆婆丧事的办理过程描写。其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吴婆婆遗留下的那一笔钱及其处置过程。谁都想不到，吴婆婆居然省吃俭用地攒下了一万五千八百块钱。吴婆婆虽然已经离世，但仅只是这一笔钱，就足以想见这位乡村老妪平日里异常节俭的生活状况。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笔钱的如何处置上。尽管一家人都同意把钱留给三小，但在三小再次离家之后，二小哑子却在无意中发现了那包钱。大小遂想起了三小说过的一句话：“可怜我二哥是个哑子，老来老去比我都可怜。”就这样，大家关心着三小，而三小则关心着二哥。一个乡村普通人家弥漫着的浓浓人伦情怀，着此一个细节便得到了强有力的艺术表现。

情感、心理是什么？情感、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很多时候，只有透过这样的文学表情，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认识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变迁中的复杂时代。对于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写作中的富有内在艺术韵味的情感叙写，我们显然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把握。

具有深度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

对于小说写作来说，在深入挖掘勘探人性的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作家总体创造能力综合体现的一种结果。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深刻地映现着一个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有力地表现着一个作家对于深邃人性世界的体验与勘探能力，同时更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对于人性的把握凝聚体现到某一人物形象身上的艺术构型能力。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创造能力的最合适的艺术试金石之一。”[1]实际上，并不只是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也同样需要塑造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这一方面，鲁迅先生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虽然一生都没有写作过长篇小说，但那些长久地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很多篇都有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观察一下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状况，就不难发现，那些获得了思想艺术成功的作品，其中也都有着人物形象的鲜活描摹和生动刻画。

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的引人注目，即在于玉米这一女性形象的发现与塑造。细读文本，就可以发现，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玉米的人生命运，和整个家庭的盛衰起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具而言之，玉米先后经历了三次对其影响颇深的大事件。第一次是弟弟小八子的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女人只有生下男孩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才算为这个家庭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惟其如此，小八子的出生才意味着曾经连生七个女儿的母亲苦难命运暂时结束。母亲的命运遭遇，在玉米幼小的心灵之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正因为同样身为女性，所以，我们才断言小八子的出生，促使玉米完成了第一次心灵蜕变，迅速成熟起来。然而，玉米毕竟只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随着生理和心理的逐步成熟，她开始“憧憬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来，有了对爱和被爱的渴望，待到飞行员彭国梁出现，她的心灵也就开始经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爱的洗礼了。然而，由于父亲王连方被捉奸在床并被免去了支书的职务，这个家庭突然一下子坍塌下来，两个妹妹也被报仇心切的村人强奸了。但最让玉米无法承受的，却是她唯一的心灵支柱——彭国梁的突然宣布退亲。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玉米最终做出了嫁给“权力”的出格举动。很显然，在交代退亲这一事件时，毕飞宇是沿循着这样的一种发展脉络而展开的。即王连方失去权力——妹妹被

[1] 王春林《繁荣中的沉潜与拓展》，《文艺争鸣》，2006年5期。

强奸——村人给玉米造谣——彭国梁解除婚约——玉米极度失望并转而追求权力。由此而来的三重信息分别是：首先，父亲王连方失去权力固然是造成玉米后来疯狂追求权力的诱因，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彭国梁解除婚约主要是因为怀疑以致确信玉米已经失身；其三，王连方被免职与彭国梁提出分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造成玉米第二次命运转折的真正原因是“爱情”而不是“权力”。当玉米的心气跌落到谷底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她心态开始扭曲的前奏。在经过一番痛彻心扉的煎熬之后，她才最终决定嫁给一个有权力的人，以拯救这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家庭。这样，她的选择也就具有了某种悲壮的意味。通过王连方的联络，她草草地嫁给了刚刚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开始了自己虽然屈辱变态但却心甘情愿的另一种生活。这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她人生中第三次大的转折，同时也是最具根本性的一次转折。她与郭家兴之间并没有丝毫爱的成分，有的只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她的曲艺奉承，她的委曲求全，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兄弟姊妹。从这一点来看，她对郭家兴乃至郭家都没有任何温情或者眷恋的成分，她的心早已经死了。可是她的心却又是活的，她唯一没有泯灭的，就是对家人尤其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死敌”——玉秀的同胞亲情。可以说，玉米命运变迁的三次转折，都缘于她主观上的心理律动，缘于对母亲的爱、对彭国梁的爱以及对妹妹的爱。正是这样的爱，才最终促成了玉米的心理扭曲，才使她成为一位颇具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

迟子建中篇小说《晚安玫瑰》中的赵小娥这一女性形象，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小娥，可以说是一个生活不幸的普通女性。导致其不幸命运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她的非婚生子女身份。她是母亲被别人强奸之后的生命造物。正因为她曾经因为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身份而饱受屈辱，所以，当她终于有机会发现当年的施恶者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的生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采取各种手段多方求证，最终确证穆师傅果然就是当年的那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法清洗的耻辱的强奸者之后，赵小娥就想方设法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行动了。赵小娥把穆师傅诱骗至松花江上的游船上。穆师傅在终于明白赵小娥因为当年的强奸行为而欲置自己于死地，求情无果之后，采取了一种毅然决然的自我了断行为，“纵身跃入波涛之中”。赵小娥觉得，“那晚的月亮在我眼里就像野鬼，惨白惨白的。”这哪里是在写景，迟子建这里写出的，只可

能是赵小娥的一种真实心境。无独有偶，与赵小娥故事具有同构意味的是很多年前的吉莲娜。在伪满日本人统治期间，一位日本军官看上了吉莲娜。为了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犹太复国理想，吉莲娜的继父不惜违背继女的意愿，煞费苦心地设计让日本军官占有了吉莲娜的身体。从被骗失身的时候开始，吉莲娜就想着报复，意欲索要继父的命。“她买了砒霜，每隔一周，悄悄用牙签将它们从烟嘴和烟葫芦拨拉进烟身，为他设计了一条死亡通道。”果然，在吉莲娜实施报复行为之后不久，她的继父就一命呜呼了。一个害死了自己的生父，一个害死了自己的继父。尽管说生父与继父对于她们都犯下了难以被饶恕的罪过，但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报复之后，赵小娥与吉莲娜实际上都成了有罪的灵魂。然而，或许是因为她们身后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缘故，两位女性对待自己所犯罪过的态度不仅截然不同，而且还因此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赵小娥自以为自己正义在握，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强加辩护的时候，吉莲娜却在认真地清洗自己的罪过。吉莲娜之所以会认真地赎罪，与她身为犹太人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得知了赵小娥的弑父行为之后，吉莲娜告诉赵小娥，“她忧戚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她说我逼死了父亲，可从我的眼神中看不到忏悔，这很可怕。她说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终于，在吉莲娜如此一种救赎情怀的强烈感召之下，在吉莲娜不幸弃世之后，赵小娥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灵魂。到最后，当赵小娥最后认识到自身的罪，并且以给生父穆师傅买墓地的方式安妥自我灵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吉莲娜一种宗教情怀的感召下，她的那颗有罪的灵魂，终于实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精神救赎。一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就此得以诞生。

中篇小说能够塑造有深度的人物形象，篇幅更为短小的短篇小说，也同样如此。姚鄂梅的短篇小说《狡猾的父亲》的艺术成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亲这一形象的鲜活刻画。从小说的标题即不难见出，与那些我们惯常所见的总是被讴歌赞美着的父亲形象不同，姚鄂梅小说中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具有负面色彩的父亲形象。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形也确是如此，作品的主体故事情节，就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围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与自己的三个儿子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争斗。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三个儿子出乎本能地结成了“统一战线”一直对“父”，但争斗的最终得胜者却往往总是父亲。由于小说采用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